



南 南 南 下 下 下

新中国的集结号

叶顶
编著

华国锋 田纪云 迟明堂 武光 顾准
李士英 王芸 张林苏 催保成 陆文启
王月廷 韩发控 任连衡 费跃卿 王瑞迎
候延芝 张秀江 王洪合 满浩然 王乐三
候波 宫家和 武春容 赵建中 尹作让
焦裕禄 王泮亭 王凤元 马际堂



南下干部沉浮录

武汉出版社

仅以此书献给南下的干部、战士以及他们的后代！

南下南下

新中国的集结号

叶顶 编著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的集结号：南下，南下！/叶顶编著．—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430—5083—9

I. ①新… II. ①叶… III. ①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史料
IV. ①K26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8331号

编 著：叶顶

责任编辑：王冠含

封面设计：点金设计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430015

电 话：(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 zbs@whcbs.com

《往事》编辑部策划、发行

印 刷：湖北昌虹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 字数：250千字

版 次：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9.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 言

南下，南下！是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底吹响的成立新中国的集结号。成千上万的干部战士组成一支支纵队，从山东、山西，从血红雪白的黑土地出发，告别妻儿老小，穿过丛林密嶂，越过崇山峻岭，渡过黄河长江……

回首往事，我们可以这样说：南下奠定了新中国的政权，南下是一部凝固的历史。

转眼间，60多年的风雨历程已经过去，昔日的南下壮士大多逝去，健在者也年逾古稀。他们中大多数没有为自己的后代留下一分钱的存款，但是他们留下了可贵的奉献精神，留下了一座座历史丰碑，他们将永垂青史！

谨将此书献给——所有的南下干部、战士和他们的后人！

长鸣

2010年5月20日

迟浩田上将为电视剧《南下》写信

南下

迟浩田

日前，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看完鲁剧《南下》后，写给中共山东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群一封感怀书信。作为当年南下的一员，山东老兵迟浩田对南下那段历史非常熟悉，感触颇深。他在信中表示，《南下》是一部极佳的电视剧，仿佛又让他置身于大军南下、激情燃烧的岁月。

由山东影视集团打造的电视剧《南下》是反映南下干部这一特殊英雄群体的电视剧，主要讲述了解放战争胜利前后，1.5万名山东地方干部南下接管上海的艰难成长历程。山东省委宣传部对这部首度全景式展现“南下干部”事业和情感生活的电视剧作尤为看重，将此视为推动建设山东经济文化强省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并将该剧交给齐鲁电视台全国首播。作为该台的开年大戏，2010年1月1日晚，《南下》率先与山东观众见面。剧中开头有逼真的战争场面，彰

显出恢宏的历史气势，还有南下干部在上海接管政权、建设城市过程中生动而耐人寻味的情节。

迟浩田上将是山东烟台招远人，1945年7月入伍，先后任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第15届中央政治局委员。80岁高龄的他，始终对山东有一股浓浓的乡情。在孟良崮战役中，迟浩田上将光荣受伤，曾经得到沂蒙老区红嫂的悉心照顾，与沂蒙老区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济南第一团”华东野战军第9纵队73团的一员，亲历淮海战役，并随军打过长江去，是南下大军的一员。

迟浩田表示，看完《南下》后，他最深刻的印象是：一、场面宏大，气势磅礴，把淮海战役的车轮滚滚、人民战争壮观的声势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二、思想性、艺术性、故事的生动性都比较好，体现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和初进上海的复杂情景；三、演员阵容强大，群星灿烂、光彩夺目，给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发人深思、催人奋进、感人泪下。对于一个亲自投身淮海战役、随军解放南方的山东老兵来说，《南下》中振奋人心的场景和情节让迟浩田至今仍怀有强烈共鸣。

“这是一部非常非常好的连续剧，公演后定会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和好评，其深远影响不会亚于《闯关东》！我作为一个山东老兵，真为故乡自豪。”迟浩田在高度评价电视剧《南下》的同时，还表示，希望山东省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群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弘扬光荣传统，坚持与时俱进，贯彻科学发展观，再创辉煌。迟浩田上将还为《南下》专门题写了“南下”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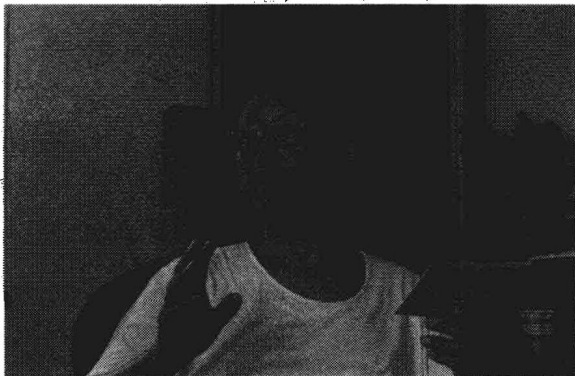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军号嘹亮，齐鲁壮士誓师南征

齐鲁多壮士，自古出英雄。提起当年的南下大军，就不能不提到山东。1949年，由于山东等老解放区干部资源比较丰富，党中央决定从山东调集1.5万名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的政权建设。山东南下干部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他们离开相对稳定的家乡，奔赴战火尚未停息，土匪、特务横行的江南，他们在那里建设人民政权，发动剿匪反特斗争，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

众志成城下江南

党史研究专家丁龙嘉认为，山东干部南下只是“南下”这一大话题的一部分，放在解放战争史上说，“南下”就是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和老解放区干部，挺进长江以南地区解放全中国的过程。丁龙嘉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南下就是“打过长江去”。丁龙嘉还就整个山东干部南下过程作了回顾——

作为全国“南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山东干部南下也是当时党中央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为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1948年



党史研究专家丁龙嘉

南下

新中国的集结号

12月，华东局召开了由各战略区领导参加的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部署了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并于12月25日作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该文件指出：因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是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1.5万名南下干部的名额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在准备中央所要求的1.5万名干部的同时，还要提拔大批干部补充本区，使华东解放区本身的工作仍能继续进行和发展。

山东干部南下的主要特点，是成套整建制地抽调，以区党委（或省委）为单位，配备整套班子随军前进，到新解放区建立党政军机构。

华东局《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还就1.5万名山东干部的落实做了具体分配。华东局直属机关：1套中央局级，1套区党委级，5套半地委级，15套县委级，另配城市工作干部1475人，共调干部3009人；鲁中南区：1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级，共调干部3680人；胶东区：1套区党委级，7套地委级，42套县区级，共调干部3650人；渤海区：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456人；济南特别市：1套区党委级，2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576人；昌潍特区：半套地委级，5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404人；潍坊特别市：3套县委级，共调干部225人。后来，各地实际南下的干部数目超过“指示”中规定的数目，各级领导班子的架子数目也有较大变化。如，鲁中南区原计划给南方新区配备40套县区委级架子，实际上仅县委级的架子就配备了50套；原计划南下干部3680人，实际南下干部达到5000余人。

“被抽调干部对于南下的指示是坚决服从的，但也因为认识上的问题，有一些顾虑，比如担心不适应南方的天气、吃不惯大米等。”

在抽调干部南下的过程中，高级干部的带头作用非常重要。胶东区党委，仅区党委直属机关的南下干部就有230人带头报名。鲁中南区党委于1949年1月召开了各地委组织部长会议，区党委秘书长张雨帆、区党委委员李培南、民运部长刘建中等带头报名南下，对工作的开展起了促进作用。渤海区党委副书记刘格平、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周贯五带头报名，不久便成立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第3支队，周贯五任支队长，刘格平任支队政治委员，于4月份带领渤海区数千干部南下新区。

山东南下干部的数量远远不止1.5万，由于各级党组织的努力，使山东的南下干部工作得以顺利完成。据不完全统计，山东实际南下新区的干部为22968人，超额7968名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另外，华东建设大学近千名学员也随军南下新区。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再次下达给山东解放区1200名南下大西南的干部指标，后来考虑到山东经多次大规模的干部外调，各方面的干部都比较缺乏，便减少了这次外调干部的名额，这次南下干部实际为350人。

南下新区的广大山东干部，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贵州、四川、福建、云南、广东等省市，同当地党组织和干部一起，为新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南下干部渡江之后初期的任务是“接管、接收”；然后才是“管理、接收官僚资产阶级的资本，转化为国营经济；在恢复社会秩序方面，要镇压反动分子（包括土匪、流氓），救济无法生活的市民。

危机四伏在浙江

王杰，原名王乃恩，是王尽美次子，1923年1月出生，山东诸城人，初中文化。1938年12月参加革命，1939年4月

南下

新中国的集结号

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委组织委员、副书记、书记、县委秘书；1949年4月随军南下，任义乌县委委员、组织部长、纪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1951年11月至1954年4月兼任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4至第8次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后调至杭州、上海等地任职。1992年12月离休，定居上海，离休前任上海市委交通办副书记。下面是王杰对于当年南下征战的回忆——

1949年4月，王杰所在的南下中队，穿过新安镇、徐州、淮阴，又过了镇江、杭州，一路急行到了浙江金华。

他们沿途经过的都是刚解放的地区，到处是南下的部队、支前的民工及被押送的国民党军俘虏，道路常常堵塞。当时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南下途中还有不少国民党残余势力，所以南下干部在行进途中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南下干部不带武器，但随行的有武装班。

虽然南下干部中队不是战斗单位，但也危险不断。白天，国民党飞机在空中盘旋寻找目标，不时扔下一串串炸弹。一次，他们中队乘小船过河，国民党飞机发现后尾追不放，投下的炸弹掀起冲天浪花，小船在巨浪中左右摇摆，险些被打翻。那真是一次与敌机捉迷藏的历险啊！夜晚吃住都有困难，人多没有地方睡，他们就睡门板。没有门板，干脆铺些稻草睡在地上，可是，躺下后稻草中就钻出一条条蛇，哪能睡得着。

在漫长而困难的行军途中，有的人病倒了，有的人思想不稳定。担任支队支部委员的王杰，同其他支部委员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讲目前的大好形势，讲南下的重大意义，每到一地，支部委员们又跑前跑后，安排食宿，照顾病号。在党支部的凝聚下，思想波动的人逐渐稳定下来，病号也坚持行军，全中队90多人没有一个掉队的。

王杰他们到达金华后，根据金华地委的指示，迅速奔赴

义乌县开展工作。义乌是一个有30多万人口的县城，四周群山环抱，中部是丘陵，浙赣铁路横穿境内。这里虽已解放，但是基层政权还在地主恶霸手里，国民党残兵和当地土匪躲藏在深山中，经常窜出来杀害军民，先后有100多名党员、积极分子被他们杀害。城内房倒屋塌，物资极度缺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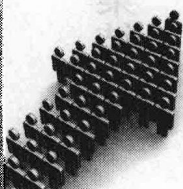
王杰所在的南下中队，接收的就是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破烂摊子。王杰说：“根据金华地委的决定，我们首先建立了县级政权组织。1949年5月21日，义乌县委宣告成立，南下中队队长刘胜洲任县委书记，董党任县长，介信秋任民运部部长，洪仕任宣传部部长，我任组织部部长。其他干部分别派到各区，组建区委、区政府。南下干部和地方同志组成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迅速开展工作。”

机构建立后需要干部，县委责成王杰举办干部培训班。王杰根据县委决定，招收了一批有一定思想基础的青年学生进行培训，然后派到基层。这批青年学生到基层后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的成为骨干。

义乌县委成立后，当务之急就是配合部队剿匪。为此，县里成立了剿匪指挥部，县委人员作了分工，王杰同解放军一个连负责义东区。

义东区一带山高林密，林中蚊虫又多又大，叮人很厉害。当时又是多雨季节，林中阴暗潮湿，道路泥泞。王杰说：“我们道路不熟，语言不通，进到深山里困难重重，有时迷失方向，转半天也转不出去。夜晚天黑路滑，追击土匪有时是一个跟头接一个跟头，浑身上下滚满泥水。”

王杰回忆说，南方的天气让这些南下的北方干部很不适应，“我们没有蚊帐，夜晚露宿在地铺和门板上，蚊子叮得我们满身血包。我不幸得了疟疾，一会儿满面通红、口渴难忍，一会儿又冷得发抖，浑身发颤。每迈一步都非常吃力，但还得跟随部队在这深山老林里与土匪周旋。”由于没有及时治疗 and 休息，王杰患上疟疾后3年才治愈。



南下南下

新中国的集结号

1949年7月至12月，义乌全县共歼灭武装土匪14股计1445人。另有8股未在山上活动的土匪计158人，亦先后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1950年12月30日晚，义乌最大的匪帮首领吴模被击毙。至此，全县的武装土匪基本肃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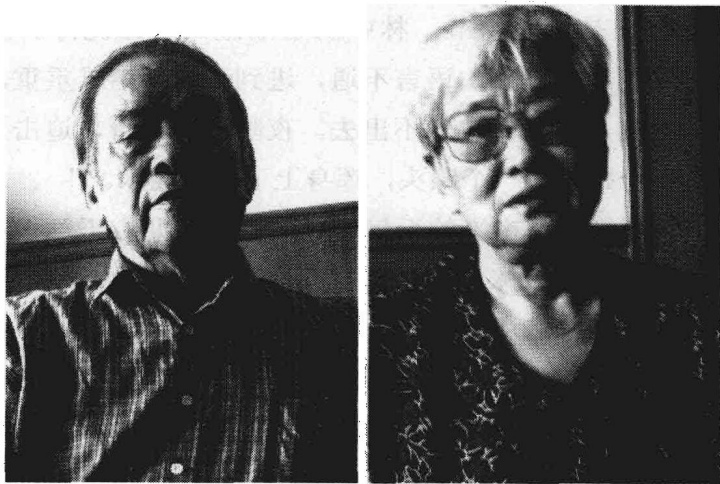
由于条件所限，山东南下干部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在管理城市的过程中，这些干部要迅速补充文化知识，以适应管理城市的需要。王杰的夫人就是一个典型。

王杰随军南下时，王杰夫人在家乡当妇救会长。王杰调到杭州工作之后，王杰夫人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来找他。“她过来找我的消息我根本不知道，也许是听到一些南下干部进城之后换老婆的消息，她就带着孩子南下了。”王杰说。

从山东到杭州，王杰夫人走了两个多月。进城后的王杰夫人不甘心做一个家庭妇女，很快进入浙江省委党校附中学习。王杰回忆道：“她的文化底子比较薄，从语文、算术、化学学起，虽然基础差，但她不服输，学习比较刻苦，每学期的成绩，都能在班里进入前三名。”

王杰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自己的夫人进入浙江省委党校附中学习时，自己的儿子也在那个学校上初中，母子两人成同学，一时传为佳话。

《南下》剧中的原型



朱善良、孙秀芳夫妇

1949年，朱善良和孙秀芳分别从苍山和陵县南下，辗转浙江、上海，他们的经历，在山东南下干部中比较典型。1954年，朱善良调到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工作，孙秀芳也于1956年调到上海，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朱善良、孙秀芳一直工作在上海的文教战线上。

从上海博物馆党委书记位子上离休的朱善良，今年80岁了。在1949年南下之前，朱善良做得比较多的是青年工作，“我1945年参加革命，在临沂县做儿童团长，后来做区里的青联会长。听到要南下的消息，我们很高兴，说要到江南去，那时候我理解的江南就是苏南地区，我们很愿意到各方面条件相对不错的苏南地区去工作。”

不过在随后的工作调整中，胶东区的干部多去了苏南，朱善良所属的鲁中南区和孙秀芳所属的滨海区，都去了浙江。“那时候我和孙秀芳分属不同的南下大队，还不认识。”朱善良所在的南下大队编入解放军190团，奔赴徐州，再继续南下到蚌埠、合肥，然后到巢湖整训。

1949年4月20日夜間，人民解放军打响渡江战役的第一枪。4月21日，朱善良所在的190团作为第二梯队开始渡江，“我们12个人，一人一把桨，船刚划到江中心，就遭到英国军舰的炮击，我们只好返回来，22日才过去，然后继续南下。”

杭州市1949年5月3日解放，朱善良等南下干部5月5日进入杭州，朱善良被派到杭州下城区委工作，初期的工作主要是收缴枪支，进行反动党团登记。恢复生产的工作随后展开，朱善良又担任了杭州市丝织业联合工会青工科的副科长，继续做青年工作。

1950年底，朱善良担任浙江省绍兴县城郊区的区长，在随后的工作中，他认识了同是南下干部的孙秀芳。

孙秀芳是家中的独女，她很担心父母不让她南下，没想到和父母一说南下的事情，父母非常开通地支持她，“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送子参军非常光荣，他们没有儿子，能送

南下南下

新中国的集结号

女儿参军（南下），他们也感到非常光荣。”整训期间学习《入城守则》以及“三年三不准”：三年内不准谈恋爱，三年内不准谈回家的事情，三年内不准接家属南下。

孙秀芳所在的大队南下时，很多路程是步行，少数大队领导可以骑马。长途跋涉让南下干部们感到非常疲惫。有一次，一位大队领导骑着马经过孙秀芳等人的队伍，为了鼓舞士气，这位干部问：“同志们累不累？”很多南下干部都说“不累”，只有孙秀芳来了一句“骑马的不累”，引起一阵哄笑。

“骑马的不累”这个情节，后来被编剧赵冬苓写进了电视剧《南下》里：刘之冰扮演的唐志先问南下干部们累不累，车晓扮演的司徒梅大喊了一句“骑马的不累”，这是唐志先与司徒梅的第一次见面，后来两人结为夫妻。

不过现实中的孙秀芳并没有同那位大队领导有进一步的发展，而是到浙江之后认识了现在的老伴朱善良。

孙秀芳南下到浙江后，先去了诸暨参与剿匪。

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南下干部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在之前国民党的宣传里，共产党被描述为“共产共妻”，还说共产党里的女兵都是被骗来当兵的。在某些地方，南下干部们一出现，当地人都会关上门，宣传工作一度无法开展。

宣传工作的深入需要一个过程，南下干部们一开始没有地方住，只好先住到庙里，“没有褥子，铺些草就能睡觉。南方的天气非常潮湿，很多南下干部都长了疥疮。”为了让当地人了解解放军和南下干部，孙秀芳就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当地人，让大家明白“共产共妻”是谣言。

对于当时年龄比较小的孙秀芳来说，在南下浙江相当长的时间里，不适应的还有语言和饮食，“当地人说话我们听不懂，也不习惯吃大米。当时我们实行供给制，发米票和面票，山东的南下干部就用自己的米票换当地同志的面票。”

老兵剿匪不用枪

从一个在苏鲁边界打游击的普通战士，到先后担任5所高校的党委书记，南下干部胡友庭的经历可谓颇具传奇色彩。谈及往昔，87岁的胡友庭老人说：“我的一生可以分为这么几段：1949年以前，在苏鲁边界打游击；1949年随军南下接管杭州；随后到上海工作，在几所大学当党委书记（副书记或第二书记），其间短暂到福建工作，也是当高校的党委书记；最后回上海，依然是当高校的党委书记。”

山东干部南下初期，主要的工作是剿匪、反霸、恢复生产。胡友庭老人回忆说，自己的剿匪工作“走了捷径”，所以能够较早地腾出时间来恢复生产。

“1949年之前，我主要在鲁南一带打游击，南下之前，我是中共赵钤县委民运部部长、宣传部部长，赵钤县就是现在的苍山县兰陵镇一带，我也算是一个老游击队员了。”胡友庭回忆说，“杭州1949年5月3日解放，我5月7日就任杭州市艮山区区委书记，给我配备的副手，有以前山东临城县的县长，还有来自德州的一个公安局长。我们到任后，首要的任务就是依靠以前的保长，然后剿匪、反霸，稳定局势。”

国民党撤退时，把以前的一个土匪委任为区长，这个土匪以前经常在这一带烧杀抢掠，群众基础不好，胡友庭抓住这个特点开展剿匪。

“当时解放军某部经过杭州想继续南下，但因为敌人把钱塘江大桥给炸毁了，解放军暂时停留在杭州。我找到解放军某部的一个团长，说借一个连的兵力给我，我先用几天来剿匪。这个团长很爽快，调了一个连的兵力给我，我把一个连的兵力分成3部分，我和区委的另外两名负责人分别带一队，日夜在我们的辖区穿插巡逻。我告诉辖区的群众，只要看到土匪，就高声地喊，然后我们就带着解放军过去。这样喊来喊去，土匪根本不敢在我的辖区里呆了。大约一周的

南南下

新中国的集结号

时间，土匪的势力彻底垮掉了。”

几十年后，在对记者讲起当年的剿匪经历时，胡友庭依然非常兴奋，“我是在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干出来的，对付这些土匪还是有办法的。”

剿匪工作完成后，恢复生产的任务也急迫起来，“要开展生产，就得是先实施救济，当地生产资料、粮食非常缺乏，就需要从北方老解放区运过来救济市民，这个工作大约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

纺织业是杭州市艮山区的主要经济形式，也是胡友庭等人恢复经济的重点，“当时是5月，蚕丝就要下来了，我们区委、区政府的人就下去协调供应桑叶，准备收蚕丝。因为如果蚕丝卖不出去，整个工厂是要垮掉的。所以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纺织业恢复正常生产。”

胡友庭说，南下之前自己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只在省里五中读了一年书，可南下后先后当过5所高校的党委书记，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在不断学习。

1950年5月以后，胡友庭先后担任了杭州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以及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1953年4月，胡友庭接到调令，要他去东北搞工业，“去东北之前，华东局带队领导让我们先在上海学习。这时，我接到通知，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匡亚明找我谈话，他说，组织上已经决定让我去华东师范大学当党委书记，不要去东北了。我说我文化水平低，在高校恐怕干不好，还是去东北吧。匡亚明说，这是舒同部长的意思。我不好再反对，只好到华东师范大学就任。”

1953年以后，胡友庭先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同济大学党委第二书记、上海水产学院党委书记、福州大学党委副书记、福建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等职务。1982年再任上海水产大学党委书记，“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历次运动，我没做过对不起知识分子的事情。我为人比较和善，反右派

的时候，保护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维护了高校工作的正常开展。”

“望梅止渴”好行军



王士英与同志们合影

1948年任中共济阳县委宣传部长的王士英，是1949年南下浙江的干部，他曾撰文回忆自己南下的历程——

1949年春节刚过，济阳县委宣布了南下干部班子共130人的名单，并放假3天，要求大家做好家属工作和南下准备。我的家在陵县滋镇区三回河村，在回家路上，我盘算着如何安慰母亲，不让她老人家因为我要南下而过分难过。我父亲早逝，自幼母子相依为命。1942年，党组织调我到陵县二区当区委书记时，母亲就为此大哭了一场。现在，我要到千里之外战火纷飞的江南去，她老人家能想得通吗？

回家后，我先从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讲起，说到江南人民盼望解放军过江……母亲反问我：“你要南下了吧！”我一时真不知怎么回答好。母亲告诉我：“咱院里你立森哥回来讲，他要南下，你大娘（伯母）为此大哭了一场。东院里芳亭也要南下。我就想到你也会南下，咱不去，谁去呀！我